

从作家阶层分布看唐前期文化共同体建设

苏利国

(甘肃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兰州 730030)

摘要:李唐政权的文治武功和国祚绵延,离不开内在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力量的形成,实得益于其在国家制度、组织管理、学术思想等诸多方面对文化共同体的不断建构。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当时作家及其作品自然成为探究此问题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帝王、高级官员、中层官员、普通官员、下层官员、流外人员等阶层作家作品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不同阶层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对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表现和诠释。

关键词:唐朝前期;作家阶层;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9)04-0074-07

李唐帝国之缔造、发展、兴盛,虽经历战乱、挫折而未覆亡,保持着统一的帝国完整性,绵延达三百年之久,自有其内在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之所以如此,乃是在政府、社会诸多方面的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从政府组织、制度、管理、学术、思想等具体方面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深刻的意义上建构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唐代社会的伟大凝聚力和发展的内在张力^[1]。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在唐代前期文学中多有表现,而出身于不同阶层的作家对文化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必然有所不同,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方式和重点亦是各具特色。

在唐代前期作家群体中,除占极小比例的帝王、后妃、方外、隐逸之外,几乎皆有仕宦经历。这些分属各级别的官员(或曾为官员)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作家主体。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文学以反映文化共同体的唐代前期社会作家阶层分为皇帝、官员和平民(隐逸)三类。其中官员又细分为高级官员(一品至三品)、中层官员(四品和五品)、中下官员(六品和七品)和底层官员(八品和九品)^①。将官员分为四等,非随意之举,而是有其历史依据。

唐朝官员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

“九品已上官者,谓身有八品、九品之官。”^[2]“‘七品以上’,谓六品、七品文武职事、散官、卫官、勋官等身。”^{[2]128}于是,职事官三品以上的“议贵”^{[2]105}、五品以上的“通贵”^{[2]156}、七品以上官员与九品以上四类官员共同构成了唐代官制中的流内官员。不仅皇帝诏赏赐时按照这四个类别(有时亦将一品单独分出而成五类,或将一品、二品均单独分出而成六类),如:“一品宜赐五十匹,二品、三品四十匹,四品、五品三十匹,六品、七品二十匹,八品九品十五匹。”^[3]

事实上,在唐代官制中有一道明显的鸿沟将九品三十级官员分为两大类,而这一界限便处于五品与六品官员之间。不仅皇帝赏赐时对其标准有别,如“六品以下五匹为等,五品以上十匹为等。”^{[3]317}更为重要的是“庶官五品以上,制救命之;六品以下,并旨授。”^{[3]4818}陆贽有云:“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署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3]4818}由此可见,五品以上乃是经宰相商议后所拜之官,而六品以下则是吏部铨选之后所授之官,得官的不同权威性决定了两者在级别上的天壤之别。

收稿日期:2019-06-13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YB099);甘肃政法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6XZDLW12)

作者简介:苏利国(1978—),男,甘肃定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① 官员品阶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能固化。本文所有官员品阶,仅就其创作本文所引作品时而言。

一、皇帝

作为中国古代官僚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直接影响到治国理念、思想导向、基本国策、管理制度等重要方面。因此，关系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华夏民族认同、社会价值认同的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必然离不开皇帝的参与。在唐代前期，以文化共同体建设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皇帝主要为太宗和玄宗。

隋末大乱中凭借卓越军事才华助父开国的唐太宗，即位后有意选择了崇尚德治，辅之以法，同时文武并举，不可偏废的执政理念，上应天时，下得民心。事实上，其大力尊崇儒家礼乐制度、文化学术以期实现文治气象的举措，正是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的实际表现。作为此一伟大工程的最高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太宗在践行的同时，亦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奋斗方向、蓝图展望、经验教训及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于文学创作之中，亲手为李唐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开创了一个安定和平的时代。如《述圣赋序》云：“朝有进善之臣，野无行歌之士。节义盈于私室，狱讼息于公门。一尉候于东西，混车书于南北，由是偃组练而敷礼乐，放牛马而逸黎元。”^{[3]119} 以前代强势君主自况，理智把握作为帝王的思想倾向。如《春日望海》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4] 通过批评当时文学、音乐等，确立李唐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如《帝京篇序》曰：“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4]1} 概括其平定天下后因遵行儒道而出现的美好社会现状。如《元日》云：“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霜戟列丹陛，丝竹韵长廊。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4]8} 能意识到众志成城的重要性，中意于君臣相得。如《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云：“连甍岂一拱，众干如千寻。明非独材力，终藉栋梁深。”^{[4]8} 承华夏百王之后，以华夏正统自视。如：“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5] 以古为鉴，勇于自省、自诫。如《临层台赋》云：“彼露台之一俭，乃延德于苍生；此崇基之渐泰，方起谤于黎甿，利怀小而忘大，害弃重而思轻。”^{[3]46} 加强皇嗣教育，从顶层保障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可持续性。如《帝范序》教诲太子，称其“以少海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穡之艰难。”“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3]121}

玄宗即位之后，承袭太宗兴礼乐、施文治的理念，君臣以“贞观之治”为范本，将李唐强盛国势和人文环境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关于文化共同体建设在玄宗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与宏阔胸怀。如《喜雨赋》云：“仰重华于齐政，步文命之彝伦。何天道之云远？亦明徵之在人。……彼有凭而可举，予何抑而未许，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于我身。”^{[3]233-234} 尊崇儒典，以彰显仁义忠孝。如《孝经注序》云：“《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3]444} 怀慕太宗，并承其壮志。如《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而赋诗》云：“顾惭嗣宝历，恭承天下平。幸过翦鲸地，感慕神且英。”^{[4]26} 遥追大化过程中以履冰自箴的心态。如《过晋阳宫》云：“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4]26} 勸励封疆大吏以治民之理，从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如《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云：“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惻且存老，抚弱复绥强。”^{[4]27} 对君主臣辅以共理天下的清醒认识。如《送忠州太守康昭远等》云：“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不有台阁英，孰振循良美。”^{[4]27} 总结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如《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序》云：“乃命使者衣绣服，行郡县，因人所利，择其可劳，所以便亿兆也；乃命将士擐介冑，砺矢石，审山川之向背，应岁月之孤虚，所以静边陲也；乃命礼官考制度，稽典则，序文昭武穆，享天地神祇，所以申严洁也。乃命学者缮落简，缉遗编，纂鲁壁之文章，缀秦坑之煨烬，所以修文教也。故能使流寓返粉榆之业，戎狄称藩屏之臣，神祇歆其禋祀，庠序阐其经术。”^{[4]29}

因为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事业在太宗与玄宗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但是，胸怀天下的气度、尊崇儒道的信念、君臣相得的重要性、人文化成的期望，以及常驻于心的自诫与反躬等，则是二人共有的人文亮点。他们既是通过文学来集中表现唐代文化共同体内容的两位帝王，亦各自抵达了有唐一代国

势与文治在不同时代的巅峰。这一切,当非巧合。作为皇帝,在文化共同体建设中必然担负着设计、决策和领导的职责,其任至重,其道长远。故欲大治大化则不得缺文治,欲行文治则不可少文学,太宗、玄宗皆深谙其道。依仗共有的亮点,他们从国家最高层面保障了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能够顺利发展,并保持着良好的延续性。

二、高级官员

本文所言之高级官员,是指李唐政权中的高官显贵,其品阶在一品至三品之间。他们处于古代官僚社会金字塔的高层,对社会资源具备较大的占有、调配能力,在国家制度、组织、管理、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对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在这一部分官员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梳理、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高级官员,主要有陈叔达、颜师古、杜淹、魏征、杨师道、岑文本、虞世南、张柬之、崔日用、李峤、宋璟、张嘉贞、源乾曜、张说、苏颋、史承节、李邕等人^①。这一级别官员的文学创作,或作为表达高度责任感的介质,如张说《赦归在道中作》云:“谁能定礼乐,为国著功成。”^{[4]976}或以临近皇帝的优势适时劝谏,以间接作用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如魏征《赋西汉》等;或自觉投身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身体力行之中,如陈叔达《州城西园入斋祠社》等;或从朝廷重臣的视角出发,对文化共同体建设在国家实力、思想文化、社会风气等众多领域的发展现状予以反映。如:“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4]451}是对皇帝功德的综合概况;“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4]473}是对人文化成的形象表达;“既立省方馆,复建礼神坛。”^{[4]966}是言皇帝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坊因购书立,殿为集贤开。”^{[4]964}是言皇帝对文学人才的重视。这一阶层官员的大部分作品则是辅理政务之暇,通过典雅庄重、气势磅礴,与处于上升时代的大唐帝国遥相呼应的庙堂之文,对有益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帝王重要行为举措予以赞赏和褒扬。如张嘉贞《北岳庙碑序》、张说《大唐封祀坛颂》、苏颋《奉和圣制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感而成诗应制》等。以及对前贤功业的称颂。如史承节《郑康成祠碑》等。

此外,时代气息赋予的昂扬奋发精神,也会在一些乐府旧题中表现出来。如虞世南《从军行二首》云:“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

辉。”^{[4]470}又如,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云:“雄视沙漠垂,有截北海阳。二庭已顿颡,五岭尽来王。”^{[4]687}再如,张柬之《出塞》云:“电断冲胡塞,风飞出洛阳。转战磨笄俗,横行戴斗乡。”^{[4]1067}

对这一级别的官员而言,其核心任务为国家政事,文学必须从属于政治。因此,其文学创作总体上表现出宏观胜过微观、理性大于情感的特点。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眼界和思维,从文学角度看,这一群体的文学表现范围较为狭小,个性不够突出;但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角度看,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特点却非弱点。实际上,其表现出的对于理性和庄重的追求、真实的时代感、必要的大局观,以及切合其身份的文学表达,都是国家高层管理者不可缺少的能力。他们正是以这种文学辅助政治的方式致力于唐代文化共同体事业的建设。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所论及各级官员之品阶时,大致以本文所引作品创作时间为准,所依据的文献材料主要以《旧唐书》《新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唐六典》《通典》等为主。如将陈叔达、颜师古收入高级官员,主要依据如下:刘昉等:《旧唐书》卷六十一,第2363页。“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礼部尚书。”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29页。“从二品曰光禄大夫。”卷四“尚书礼部”,第108页。“礼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旧唐书》卷七十三,第2594-2595页。“太宗践祚,擢拜中书侍郎。……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史馆丞”,第275页。“中书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卷十“秘书省”,第295-296页。“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颜师古在贞观初虽为四品官员,然太宗爱重其才识,令其撰《五礼》、注《汉书》,封禅仪注亦多从师古之说。所受恩遇几同于三品以上官,贞观十五年,入三品之列。又如将王翰、王维等收入中层官员,主要依据如下: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王翰小传”,第1602页。王翰历昌乐尉、秘书正字、通事舍人、驾部员外、汝州长史、仙州别驾,以道州司马卒。据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七,第4660页。“仙州(汝州)户六万四千八百九十。”《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745页。“上州(注云:凡户满四万已上为上州)……别驾一人;从四品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第5051-5052页。“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第244页。“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第1234页。“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史馆丞”,第277页。“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卷二“尚书吏部”,第28页。“郎中二人,从五品上。”卷八“门下省”,第244页。“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王维仕宦履历由从八品开始,天宝末已为正五品上。据早期边塞诗如《老将行》《燕支行》等,或归王氏于下层官员;据《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等,则可归入中层官员。

三、中层官员

这一阶层的官员，品阶为四品、五品。其地位虽低于高级官员，然其官职仍为制敕所命而非旨授，故有“通贵”之称。作为末等贵官，他们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力逊于高官，但其处于朝廷官员由显贵到普通的分水岭上，而且人数众多。故而，对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在这一群体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中级官员，主要有袁朗、李百药、孔绍安、崔湜、陈元光、薛曜、李义、孙会、王翰、王维、丘为、薛据诸人。

从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这一群体涉及的范围要比高级官员广泛。其中有的颂扬帝王功德，如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李百药《奉和正日临朝应诏》、薛曜《舞马篇》、李邕《春赋》、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等；有的对边塞题材有所反映，如孔绍安《结客少年场行》、崔湜《大漠行》、李义《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王翰《凉州词二首》、王维《老将行》《燕支行》等；有的褒美儒家圣贤以及忠孝节义思想，如孙会《苏仙碑铭》等；亦有对美好人文环境的描画，如王维《听百舌鸟》《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声依次用各六韵》等。

具体而言，这一群体官员在创作的内容和风格上既有非常接近高级官员的一面，也有与其相异的地方。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对边塞诗歌的创作有所侧重，这一群体既有京官也有外官，社会接触面较为广泛。同时，其地位与功业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唐代前期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激励之下，积极投身于边塞诗歌的创作实为正常之举。而且，他们之中还涌现出能够结合自身守土封疆的切身体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官员，如陈元光《落成会咏一首》等。其次，与高级官员偏理性，重庙堂之文不同，中层官员群体在文学创作中并不介意丰富情感的真实表达，如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丘为《冬至下寄舍弟时应赴入京》等。而这些官员未曾显贵之时，更是钟情于圣贤事业的赞赏感喟和功业情思的率性直抒。如王翰《飞燕篇》、薛据《古兴》等。

四、普通官员

这一阶层的官员，品阶为六品和七品。在旨授官员之中，其级别较高。作为下层官员中的上层官员，李唐官僚群体中由普通到显贵的衔接部分，其文学创作对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内容的表现，自然有其独

特之处。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普通官员，主要有杜审言、司马逸客、武平一、王勃、杨炯、宋之问、崔融、沈佺期、张若虚、李昂、崔颢、岑参、卢象、陶翰、陈兼、贾正义、张之宏、邵混之、封利建、万齐融、贾至、李华、萧颖士等人。

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几乎涉及李唐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秉承中和雅正之道者，有司马逸客《雅琴篇》、武平一《谏大飨用倡优媠狎书》、王勃《益州夫子庙碑》、崔颢《澄水如鉴》、卢象《赠广川马先生》、陈兼《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并序》、贾正义《周公祠碑》、张之宏《兖公颂》、贾至《微子庙碑颂》、李华《元鲁山墓碣铭序》《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三贤论》《杂诗六首》、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赠韦司业书》等。彰显昂扬向上精神者，有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上刘右相书》、杨炯《王勃集序》《从军行》、李昂《从军行》、崔颢《赠王威古》《黄鹤楼》、岑参《银山碛西馆》、陶翰《赠郑员外》、万齐融《仗剑行》、萧颖士《蒙山作》等。宣扬雄强鼎盛国势者，有王勃《乾元殿颂》、杨炯《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崔融《为朝集使于思言等请封中岳表》、宋之问《扈从登封途中作》、崔颢《荐樊衡书》、卢象《驾幸温泉》、陶翰《送金卿归新罗》、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李华《含元殿赋》、王譔《明堂赋》、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等。表现丰乐和美人文环境者，有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大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崔颢《雁门胡人歌》、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李华《杨骑曹集序》等。

这一群体之中名家辈出，其文学作品中的理性精神和感性力量可谓齐驱并驾，各擅其长。涌现出王勃、杨炯、宋之问、沈佺期、张若虚、崔颢、岑参、贾至、李华、萧颖士等唐代前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流人才。作为著名作家，他们或视野开阔，或艺术手法多变，或思想深邃，但笔锋最健之处皆不离于兴复雅道之责与彰显奋发之气。这种现象，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有唐前期，国力的强盛、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国人普遍表现出一种恢宏开阔的气度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从帝王至士人，无不如此。这是时代所赋予的希望与力量，任谁都无法阻挡。

然而，这批普通官员，尤其是他们中的文学精英们，必然难以接受才高而位下的现状，故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其向上精神的原动力。在奋斗具

体过程中,因为有些作家后来升任贵官(如贾至、王维等),故有机会参与国家各项重要活动,其创作风格和内容亦开始倾向于庙堂文学。而有些作家因为仕途蹭蹬,无路“献替明君”,故退而“润色鸿业”(如萧颖士、李华等)^{[3]3276}。其历经坎坷,故对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其坚守儒道,故对国家的未来更为关注。因此,他们通过文学对盛唐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完全是医者的视角和思维,实为维护和完善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声音。

五、下层官员

这一阶层官员,其品阶为八品和九品,处于李唐官僚社会体系的末端。对于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流内官员,其文学创作中对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表现,自有其值得关注的意义。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下层官员,主要有孙处玄、贞半千、陈子昂、卢藏用、富嘉谟、吴少微、骆宾王、卢照邻、郭元振、王泠然、王湾、徐九皋、乔琳、刘庭琦、赵晋用、齐光义、李白、杜甫、贺朝、王昌龄、荆冬倩、储光羲、王之涣等。

置身于这一群体中的文学家们,凭借驾驭多样主题与不同体裁的过人能力,将文化共同体在唐代前期的重要内容尽情呈现。如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朱虚侯赞》《古风》等是弘扬儒风;《塞下曲》《塞上曲》《出自蓟北门行》《紫骝马》《从军行》《长歌行》《幽州胡马客歌》《与韩荆州书》等是着意功名;《明堂赋》《大猎赋》等是润色帝业;《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观胡人吹笛》《赠清漳明府侄聿》等则是对清明政治下美好人文环境的各种表达。

又如陈子昂、卢藏用、骆宾王、卢照邻、王昌龄、杜甫、储光羲等,《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感遇诗》《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和学士闺情诗启》《乐府杂诗序》《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意在继雅道;《登幽州台歌》《答洛阳主人》《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于易水送人》《紫骝马》《结客少年场行》《咏史四首》《从军行七首》《九江口作》《上李侍郎书》《别刘谕》《望岳》《登戏马台作》意在取功名;《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登封大酺歌四首》《南阳公集序》《对蜀父老问》《驾幸河东》《封西岳赋》《越人献驯象赋》《洛中贻朝校书衡》《送人随大夫和蕃》《献高使君大酺作》《同诸公秋日游昆明

池思古》意在彰国威;《至分陕》《风凉原上作》《忆昔二首》意在记述当时人文环境。其余作家作品,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反映虽不如文学名家全面、丰富,但作为整体予以关照,仍不难看出其创作的方向,而且亦不乏可圈可点的名篇。其中关于秉承中和雅正之道的作品有:孙处玄《重修顺祐王庙碑》、富嘉谟《明冰篇》、吴少微《哭富嘉谟》《过汉古城》《古意》、乔琳《巴州化成县新文宣王庙颂并序》、赵晋用《赛雨纪石文》、齐光义《后汉□亭乡侯蒋澄碑》等。彰显昂扬向上精神的作品有:贞半千《陈情表》、郭元振《古剑篇》、王泠然《论荐书》、徐九皋《途中览镜》、刘庭琦《从军》、杜甫《望岳》、王之涣《登鹳雀楼》《凉州词二首》等。表现丰乐和美人文环境的作品主要有:王湾《次北固山下》、梁锜《赠李中华》等。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一部分官员与普通官员在对文化共同体题材的关注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弘扬儒道与建功立业的诉求尤为突出。不过,除去《重修顺祐王庙碑》《巴州化成县新文宣王庙颂并序》《赛雨纪石文》《后汉□亭乡侯蒋澄碑》等具有官方纪念性质的文字,关于兴复儒道主题的作品已所剩无几。诚然,社会性是文学不可剥离的属性,但其作为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成员,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共性原则的遵循,唯有在共性基础上做到合理个性的适度彰显,才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因此,说这一群体文学作品中兴复儒道主题较普通官员薄弱,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如此一来,追求仕进便成为李唐流内官员底层群体最为突出的特点。论才华,同为科举出身的他们不一定输于普通官员;而论地位,他们比普通官员更低,连普通官员都难以接受才高而位下的现状,他们当然更无法接受。如果他们甘心于此,不但是对自身才华的否定,而且有悖情理。事实上,这一群体对于功业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有着异常艰辛的执着。如卢照邻《释疾文三歌》,其文云:“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4]520-521}即使僵卧孤村,也不向命运低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和无助,始终与现实世界的自尊、自信、功名、风骨紧紧相伴。故此必将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宝贵财富。而在死而不悔的生命动力背后,自然离不开建立于李唐强盛国势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润物无声的力量。

六、流外人员

唐代前期有一部分作家虽创作了关于文化共同体内容的文学作品，但生平资料过于简略，未见入仕的相关记载。故本文暂将其与平民、隐士作家归于一类进行研究。如刘希夷、杨重玄、祖咏、常建、程弥纶、万楚、杨颜、陈章甫等。

这一群体亦有颂扬儒道的作品，如程弥纶《怀鲁》、陈章甫《梅先生碑》、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陪卢明府泛舟回作》等；有彰显昂扬精神的作品，如刘希夷《从军行》《将军行》、杨重玄《正朝上左相张燕公》、祖咏《望蓟门》、孟浩然《洗然弟竹亭》；有描绘人文环境的作品，如祖咏《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常建《落第长安》、万楚《题江潮庄壁》、杨颜《田家》、孟浩然《长安早春》等。

尽管受资料限制而不能排除某些作家有仕宦经历的可能，但这一群体中的主流仍是平民阶层。对其作品分类统计之后，几乎看不到宣扬李唐强盛国势的题材，这主要是由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所决定。作为平民阶层，在整个社会都为功业而奋斗的时代，他们孜孜汲汲于功名勋业，极其正常；而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是腹有才华却沉于下僚的作家赖以立身的精神支柱；和平安宁是唐代前期的社会大背景，在李唐着力推行文治教化的努力下，社会人文环境自然有所发展、进步，身处其中的平民作家们，社会地位决定其很少去表现国势的雄强鼎盛。其实，他们将笔触停留在身边生活中的种种美好事物之间，便是对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表现的最大贡献。在唐代前期，即使是隐逸诗人，也并非将自己与社会刻意分开，他们甚至对于此一时期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努力成果也表现出某种欣赏与肯定。如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云：“乱极则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吾徒江海之士，击壤鼓腹，输太平之税耳，帝何力于我哉？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士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3]1323}以隐逸身份，对处士而谈，故其论当非虚与委蛇之言。王绩此语，真切道出隋末大乱后人心思治的迫切愿望。生活于隋末唐初，

生平已不可细考的陆敬，其作品亦表露出相似情感。如《游隋故都》云：“来苏仁圣德，濡足乃乘乾。正始淳风被，人劳用息肩。舞象文思泽，偃伯武功宣。则百昌厥后，于万永斯年。”^{[4]455}事实上，唐初君臣致力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作为正好契合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心态。

要之，通过对唐代前期作家予以阶层分布的整体关照，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对文化共同体建设情况的反映既存在共性又不乏个性。作为最高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李唐前期皇帝（主要指太宗、玄宗两位英主）从国家顶层给予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而高级官员对于理性和庄重的追求、真实的时代感、必要的大局观，以及切合其身份的文学表达，反映出其人是文学辅助政治的方式致力于唐代文化共同体事业的建设。与高级官员偏理性、重庙堂之文有所不同，中层官员群体在文学创作中并不介意丰富情感的真实表达，在未曾显贵之时，更是钟情于圣贤事业的赞赏感喟和功业情思的率性直抒。就普通官员而言，他们表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理性精神和感性力量可谓齐驱并驾，各擅其长。因为不能满足于才高位下之状况，故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其向上精神的原动力。在这一群体中，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仕途多蹇却未曾放弃坚守雅道节操的作家们，其人对于时代、社会的批判，不是否定，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建设。下层官员在对文化共同体题材的关注和表现方面，和普通官员甚为相似。然而，作为李唐流内的底层官员群体，其才高而位下的境况更为明显，故对于建功立业的期望和对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更甚于后者。平民阶层的作家，需要儒家思想作为立身的支撑，又有着与时代一起追寻功名的自由，但下层社会地位决定了表现国势实为其弱项，而作为体裁补偿，对身边美好人文环境的生动描绘则成为其强项。总体而言，整个唐代前期，每一阶层的作家，不分贵贱，不限地域，都沐浴在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息中，以其各具特色的方式对文化共同体建设予以表现和诠释。

参考文献:

- [1] 雷恩海, 苏利国. 论唐朝文化共同体建设: 以萧颖士“化理”思想为中心的考察[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36-42.
- [2] 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33.
- [3] 董浩, 阮元, 徐松, 等.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17.
- [4]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240.

Cult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Writers' Clas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SU Ligu

(School of Humanities,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ivil governance and martial arts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continuous, which needs inner cohesion and vitality. The formation of this power should give thanks to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tate system,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cademic thinking and so on. As participants and record takers in this process,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of the time natur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xploring this issu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the emperors, senior officials, middle-level officials, ordinary officials, low-level officials, and outsiders, it is obvious that different classes express and interpre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in different ways.

Keywords: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lass of writers; cultur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 夏 强]

(上接第 23 页)

The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JIA Rui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fiel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t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and system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in colleges, which is experiencing the process of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to the college expansion. The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general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which are demonstrated b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Review, summariz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hanges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 in colleges is helpfu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s macro-control and college reform, and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guarante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property right; evolution;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责任编辑 王七萍]